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李馨岚¹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占比超过一半, 农村居民消费逐年下滑,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需要扩大内需。金融的发展对消费有很强的拉伸作用, 因此, 以贵州省 2011—2019 年 9 个地级市的消费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 为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支撑。研究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针对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加强政府激励和普及金融知识及手机金融软件的建议。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村居民消费 面板数据 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8;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消费、投资、出口被形象地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而消费才是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动力,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长期以来, 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走低, 农村居民消费率从 15.6% 下降至 8.11%,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极低, 2020 年仅为 3.2%。中国各个省发展差异很大, 消费特点有所不同, 所以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贵州省而言, 近年来, GDP 增速相当快,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持续增长, 然而, 贵州省农村居民同样表现出内需不足, 消费率逐年降低, 从 2006 年的 20.46% 下降到 2017 年的 14.29%。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但消费升级缓慢, 贵州省农村居民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上升趋势从 2012 年以后开始放缓, 增长速度从 2009 年的 9% 下降到 2019 年的 1.88%, 上升的速度越来越慢。

传统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 对于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来说金融服务门槛高, 金融服务照顾不到长尾群体, 由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普惠金融被提出, 但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限性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传统普惠金融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小微企业、农村居民等的影响微乎其微, 普惠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借助于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型普惠金融, 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和金融服务成本, 减少了信息不对称, 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捷性。它具有覆盖的区域更加广泛, 服务成本也更加低廉, 受惠的群体更加普遍等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的发展对消费有着强有力的拉升作用, 能够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的升级? 有鉴于此, 本研究利用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联合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贵州省 2011—2019 年 9 个地级市的相关经济数据, 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

1 相关文献综述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通过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成为推广数字普惠金

作者简介: 李馨岚(1996—), 女, 贵州遵义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金融学。

融的首个国际性的共同纲领。具体内容是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如电子货币、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由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金融服务得以直接呈现在客户面前，打破了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邱兆祥等^[1]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借助移动终端，移动支付在农村得以实现，只要有互联网，农村地区也能获得金融服务，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也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

在数字普惠金融提出之前，有学者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马九杰等^[2]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解决传统金融对农村居民产生的金融排斥问题，普惠金融能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支出。王曙光等^[3]提出低水平收入的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的信贷要求，而信贷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所以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信用贷款，可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需求。数字普惠金融在 2016 年被提出之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郭峰等^[4]和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团队编制了一套系统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此有大量的研究者开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崔海燕^[5]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全国东中西部有所不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会受到自身上一期消费和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即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易行建等^[6]对微观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交易便利这两个机制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强。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多，但研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少，大多都专注于研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较少，而且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偏差，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没有影响或不显著，也有学者认为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鉴于此，本研究利用最新发布的 2011—2019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贵州省 9 个地级市农村居民消费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2 理论假设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支付方式，使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得以实现，移动支付相当便捷高效，刷脸支付、指纹支付、密码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让付款在一秒钟之内完成变得可能，相比现金支付，数字化支付更加有效率，这刺激了农村居民消费欲望。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缓解了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排斥现象，由此带来的流动性约束问题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7]，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对农村居民提供信用贷款的门槛，使得长期受到金融排斥的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正规的信贷服务，有效缓解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问题。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农村居民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往往会将一部分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急用，储蓄的钱越多，农村居民用于当期消费的钱就越少，这抑制了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而购买互联网保险可以降低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正向促进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计量模型设定

选取贵州省 9 个地级市 2011—2019 年的相关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为了验证假设，构建模型如下：

$$\ln NC_{it} = \beta_0 + \beta_1 \ln DIFI_{it} + \beta_2 \ln CC_{it} + \beta_3 CZ_{it} + \beta_4 \ln R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FZ_{it} = \beta_0 + \beta_1 \ln DIFI_{it} + \beta_2 \ln CC_{it} + \beta_3 CZ_{it} + \beta_4 \ln R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是贵州省 9 个地级市, t 是年份, $\ln NC$ 是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对数, FZ 是农村居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作为消费结构的指标, $\ln DIFI$ 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对数。 $\ln CC$ 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 CZ 是社会保障支出, $\ln R$ 是人均地区公路里程数的对数, μ 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ε 是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选择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选用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选择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解释变量选取贵州省 9 个地级市 2011—2019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 该指数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最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控制变量选择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政府社会保障水平、人均公路里程。

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20), 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 2011—2020 年贵州省 9 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 EPSDATA 官网。

3.3 实证分析

利用计量软件是 Stata16, 首先根据 Hausman 检验验证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经过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式(1)和(2)分别用混合效应、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 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系数均为正,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没有很大的差距, 这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即表中的第(3)列和第(6)列, 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是 0.388, 即数字普惠金融增长 1%, 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 0.388%,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回归系数是 0.083, 即数字普惠金融增加 1%, 贵州省农村居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增长 0.083 个百分点,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促进作用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更明显。

表 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结果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1)	(2)	(3)	(4)	(5)	(6)
	OLS	RE	FE	OLS	RE	FE
$\ln DIFI$	0.468***	0.468***	0.388***	0.085***	0.085***	0.083***
	(8.57)	(6.78)	(5.06)	(9.58)	(8.21)	(7.14)
$\ln CC$	0.419***	0.419***	0.379***	0.069***	0.073***	0.072**
	(4.60)	(4.47)	(3.81)	(3.64)	(3.37)	(3.16)
$\ln R$	-0.195***	-0.195**	0.679*	0.026	0.022	0.038

	(-3.14)	(-2.51)	(2.16)	(1.52)	(0.90)	(0.70)
CZ	1.200	1.200	2.624	0.914***	1.107***	1.337**
	(1.05)	(0.87)	(1.58)	(3.34)	(2.95)	(3.10)
Constant	3.102***	3.102***	0.491	-0.892***	-0.927***	-0.989***
	(3.42)	(3.35)	(0.63)	(-4.64)	(-3.94)	(-4.95)
Observations	81	81	81	81	81	81
R-squared	0.874	0.874	0.888	0.803	0.802	0.844
CITYFE	NO	NO	YES	NO	NO	YES

注：括号中为稳健 t 统计量，“***”为 $p < 0.01$ ，“**”为 $p < 0.05$ ，“*”为 $p < 0.1$

对于控制变量，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升级都具有促进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是 0.379，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是 0.072，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更大，可能原因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相比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有很大差距，当城镇居民扩大消费时，农村居民只能在能力范围内扩大消费，因此对于更高水平消费的示范效应更小。人均公路里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是 0.679，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均公路里程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表明人均公路里程数对消费结构升级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能原因是人均公路里程数越大，交通越发达，农村居民去往城镇消费更加容易，从而提升消费支出水平，但仅仅是交通通达度变好还不足以对文教娱乐等更高一级的消费产生影响，因为在满足基本生活物质层面的消费之后还有足够的资金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消费。社会保障水平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但对于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可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同时对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们的生活必将越来越好，从而增加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即对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4 实证结论

通过研究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进行分析，得出实证研究结果与假设一致，即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但是对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对消费结构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弱。因此贵州省应该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让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发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4 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落后，供给主体少。数字普惠金融的总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第三期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贵州省和其他几个西部地区的省份处于最后一个梯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较低。目前，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主体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主。主要的县域金融机构大多是国有银行，将分支机构建设到村镇上的银行以农村商业银行为主，邮政储蓄银行在村镇的覆盖范围比农村商业银行小，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便是农村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机构不愿意做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一方面，当前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设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即便覆盖范围如此大，也仍然有 4 亿人口没有在这个征信系统内，这 4 亿人口中有 80% 处于农村地区，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占比超过一半，还有许

多农村居民没有被纳入征信系统，同时，对于收入来源，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产业受气候的影响非常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做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个银行金融机构收集到的征信信息并没有实现共享，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接触最多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其他银行拥有农村居民征信信息较少，在没有共享机制的情况下，很难通过比对判断用户信用信息的真假，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了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

其次是需求主体意愿不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产生互联网排斥的原因主要是自我排斥，而不是设施排斥和条件排斥。贵州省农村地区，青壮年很多外出打工，青少年大多在学校，只有文化水平较低的中老年人留在家里，他们对网络等新技术的自学能力很差，如果没有年轻人进行指导，智能手机也发挥不了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广，对农村居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金融教育落后和对金融宣传流于表面，农村居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主动需要金融服务的意愿不强，甚至还会有畏难心理，除了经常接触的存取款业务外，其他的程序复杂、不熟悉业务例如线上投融资、线上财富管理等不受他们欢迎。

5 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以期解决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促使数字普惠金融能持续良好发展。

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政府激励，政府要发挥好“看的见的手”的作用，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激励措施，同时要完善信用体系，要增加银行的信息获得渠道，如构建城乡信息信用共享平台，将农村居民纳入到信息系统，将农户生产经营情况、农户名誉、农户素质等作为特色指标纳入信用体系。二是要加强金融知识和手机金融软件的普及，要大力向农村居民宣传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赖农村居民对手机上金融软件的熟练使用，但是农村地区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农村居民想用，但教程冗长繁杂学不会，将教程写得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在大厅里滚动播放教程短视频，也可以引导农村居民关注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学习金融软件的使用。

参考文献：

- [1]邱兆祥，向晓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1)：5-9.
- [2]马九杰，沈杰. 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态势与金融普惠策略分析[J]. 农村金融研究，2010(5)：5-10.
- [3]王曙光，王东宾. 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 11 省 14 县市的田野调查[J]. 财贸经济，2011(5)：38-44，136.
- [4]郭峰，王靖一，王芳，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
- [5]崔海燕.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17(64)：54-60.
- [6]易行健，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金融研究，2018(11)：47-67.
- [7]赵霞，刘彦平. 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和居民个人消费信贷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2006(11)：32-36.